

元代河海漕運之媽祖文化研究

楊佳蓉*

摘要

元代定都北京，漕運經由水路運送稅糧物資，南方漕糧北運使得河海聯運，漕運任務與朝廷官軍需求、國計民生和政權穩定皆有密切關係；媽祖文化與河海漕運的發展相得益彰，大運河和海洋漕運的發展，使得交通發達、經濟繁榮，影響媽祖文化廣為傳播。

元代漕運的建立與媽祖護漕互相呼應，京杭大運河北到北京通州，取直於元代，到元代（1293）全線開通，在大運河沿岸留有很多媽祖宮廟與文物；元代演進三條漕運路線，第三條即為至元18年元世祖命令開海漕的路線，媽祖文化應海漕而更加開展，在海岸港口留有許多媽祖宮廟等遺跡；本文以元代河海漕運的媽祖文化遺跡為主題而予以探析。

本論文目標在於獲得元代河海漕運之媽祖文化的研究成果，瞭解漕運對於媽祖文化傳播的影響；展現元代大運河與海洋沿岸媽祖宮廟的具體文化現象；並探討元代儒佛道背景與媽祖文化呈現三家思想的包容性；最後探討元代貿易背景與媽祖文化所展現的經貿精神。媽祖文化影響人們的德行與涵養；大運河與海運相連，因而大運河與海上絲路相通，其中媽祖文化展現高度的海商精神，與時開創進步的文化與經濟，也藉此傳播到亞太地區和世界各地。

關鍵字：元代、漕運、媽祖文化、儒佛道思想、經貿精神

* 國立空中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Study on Mazu Culture of Canal System by river and sea during Yuan Dynasty

Chia-Jung Yang *

Abstract

Since the capital of Yuan was Beijing, tax payments and materials were transported on water through the canal system, which allowed the food supplies in the south to be delivered to the north by sea and river. The canal system in China was deeply connected with official demands, civil daily life, and social stability. Mazu culture and the canal system were interactional; the canal system of river and sea brought well-developed transportation and prosperous economy, spreading Mazu culture in a wider scope.

Establishment of canal system in Yuan Dynasty connected with Mazu, its guardian. The Grand Canal led to the northernmost Tung Prefecture of Beijing; it was straightened during Yuan Dynasty, and wholly opened in 1293. Along the Canal, a lot of Mazu Temples and relevant artifacts were left. Three routes were developed during Yuan Dynasty, and the third one was that of the way to the sea under the order of Kublai Khan at the 18th year of Yuan Empire. Mazu culture was thus further developed along with it, leaving various remains (such as temples) in the coastal docks. The study will take cultural remains of Mazu of canal system during Yuan Dynasty as the theme for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The goals of the thesis are to obtai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azu culture of canal system during Yuan Dynasty, understand how these canal systems affected the spreading of Mazu culture, show the tru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Mazu Templ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and the sea coast, and explore the background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the inclusion of three thoughts in the culture of Mazu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discuss the business spirit displayed by the trading background of Yuan and Mazu culture. Mazu brings influences to the morality and culture to people. The Grand Canal was connected to sea transportation, and thus connected to the Silk Road on the Sea, where Mazu culture showed a highly developed sea-trading spirit, initiated progressive culture and economy, and spread to Asia-Pacific areas and the world.

**Keywords: Yuan Dynasty, Canal System, Mazu Cultur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rading Spirit**



前言

自元代開始，漕運經由水路運送稅糧物資，南方漕糧北運使得河海聯運，故媽祖從原來的海神而兼為內河的水神，並成為大運河漕運的保護神，媽祖信仰產生重要的精神支持作用；並且大運河與海洋的漕運，促使交通與經濟的發展，影響媽祖文化廣為傳播，媽祖信仰亦為元代大運河漕運、海上漕運與海上絲綢之路提供重要精神力量。

漕運起於秦朝，在北宋之後更為重視，謂指由朝廷直接管理與實施的一項重大工作，通過水路將稅糧等物質運往京都或其他指定地方，對於國家的生存甚為重要。宋人張方平說：「國家漕運，以河渠為主。……今仰食於官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¹ 在元（明清）定都北京，南糧北運的漕運任務與朝廷官軍需求、國計民生和政權穩定皆有密切關係；媽祖文化與河海漕運的發展相得益彰。

本論文目的在於研究元代河海漕運之媽祖文化，首先探究元代的漕運建立與信奉媽祖的情況，瞭解漕運對於媽祖文化傳播的影響；接著探析元代漕運的河海沿岸媽祖文化，展現大運河與海洋沿岸媽祖宮廟的具體文化現象；然後研討元代儒佛道背景與媽祖文化呈現三家思想的包容性；以及探討元代貿易背景與媽祖文化所展現的經貿精神；最後是結論。希藉本文的探索研究，對於元代河海漕運之媽祖文化有更進一步的成果產生，體現媽祖慈愛助人的情懷與經世濟民的理想。

一、元代的漕運建立與信奉媽祖

元代的漕運包括大運河運輸和海運，規模高達糧食約 360 萬石，這麼大規模的南糧北運，是元代的歷史貢獻，京杭大運河也成為元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主要生命動脈，而建立此基礎的重要文化力量即是媽祖信仰，為報答感謝媽祖庇佑漕運的順利，元朝廷多次舉辦盛大的祭典。元朝廷在港口城市修建或擴建媽祖宮廟，以利官府祭拜與民間奉祀，促使媽祖信仰成為大運河沿岸和海岸港口的重要信仰。

京杭大運河始於浙江杭州，直到北京通州，開鑿於春秋時期，完成於隋代，歷經唐宋元明清，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大運河從公元前 486 年開鑿，到元代（1293）全線開通，前後持續 1779 年，全長 1794 公里。大運河

1 《宋史》，卷 93，〈河渠三〉。



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與錢塘江五大水系，經過浙江、江蘇、山東和河北四省以及北京、天津兩省市。在沿岸留有很多媽祖宮廟與文物，屬於宋、元、明、清的媽祖文化遺跡。

媽祖文化與大運河文化的發展相得益彰，京杭大運河具有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對一千多年的媽祖文化有傳播作用，相對的，一千多年歷史的媽祖文化亦為兩千五百多年的大運河文化注入信仰生命與力量。歷經宋元明清到現代，大運河沿岸的媽祖宮廟有興建、修建、沒失，媽祖文化卻在悠悠歲月裡傳播千餘年而不衰。加上元代漕運的海上運輸，媽祖信仰得以迅速傳播，遂將南方的媽祖信仰傳往北方，於天津等地皆建立了媽祖廟。

（一）元代的漕運建立

1271 年，忽必烈正式建立國號為元，建立國都於大都（今北京）；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6），元軍攻入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1279 年元世祖忽必烈以強大力量消滅了南宋，南宋海上流亡政權的殘餘抵抗力量被消除，元統一了全國，成為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直到傳位到順帝時，元朝已成官吏腐敗，民不聊生的朝代，1367 年以朱元璋為首的元末人民起義，1368 年元順帝出亡，朱遂推翻了元統一政權，將蒙古大國逐回了漠北。來去匆匆的元代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一個少數民族的輝煌征服紀錄。

元初大將伯顏丞相攻佔南方臨安時，他命張瑄、朱清負責將南宋皇家府庫收藏的珍寶圖籍北運，從崇明州海道運往北方大都，成為元代首次海上航行。自此開啟元代將江南的物資糧食，透過海運輸往大都，航行路途艱辛，故商人、船員和官員皆祈求媽祖保佑。

元世祖命伯顏籌畫將南方地區的糧食運送至國都大都。於是伯顏令人將江浙一帶的糧食先集中在揚州，再利用隋唐大運河故道將漕糧運到淮安，再經黃河運到今河南中灤，再用大車陸路運到浚縣，再經衛河入天津，再轉潞河（今北運河）運往通州，最後運到大都。此為元代第一條漕運路線。

元丞相伯顏上書朝廷建議穿鑿河渠，使大運河南北全線貫通，使四處的河水相通，他說：

2 取材自明・宋濂，《元史・食貨志卷四十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1178。



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屬，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貢京師者，皆由此致達，誠國家永久之利。³

伯顏正式向元世祖提出開鑿南北相通的大運河，受到元世祖高度重視，於是元朝廷即籌措資金、徵調人役以進行開鑿工程。

之前的漕運經道路運送的確較迂迴，於是在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命令開修濟州河，疏浚汶水、泗水等河，使得漕船到了淮安可繼續北上入大清河，再由山東利津到渤海，經海路到大沽口，再經白河、潞河（今北運河）運往通州，最後運到大都，如此皆為水運。此為元代第二條漕運路線。

至元十八年元世祖命令開海漕，由江蘇劉家港出發，繞經山東半島進入渤海，後續路線同上。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任命朱清和張瑄兩人由海道運輸漕糧，將江南米糧運至大都，海漕運輸量大為增長；1303年由羅璧專管海漕，漕運量持續增加，元京師大都的官府、吏士和平民都仰賴海漕。太倉劉家港既是河運港口，又是海運港口、海漕始點港，媽祖文化應漕運而興起，天妃廟（靈慈宮）始建於至元 29 年（1292），由萬戶朱旭所建。此為元代第三條漕運路線。

以上說明元代演進的三條漕運路線，建立漕運的原因與對媽祖信仰的影響如下，由於元代國都建於大都（今北京），而北方戰亂連年，經濟停滯，糧食不足，糧食的取得須得自南方地區，南方地區氣溫合宜，適合農作物種植，物產豐饒，可供應元政府所需，故元代實施「南糧北調」的政策。但當時的陸路交通非常不便利，糧食貨物的運送都需仰賴河海漕運，故對漕運極為重視。然漕運路途十分艱辛，當時漕運船隻簡陋，海上氣候又無法準確預知，漕運的安全順利堪憂；為祈求船員安全、漕運順利，崇拜媽祖的活動隨之熱烈，媽祖護航的作用被需求，元代負責漕運的官員和船員承襲宋代沿岸人民的信仰，依賴媽祖的保佑，而媽祖亦屢次顯現神跡。如此情況到明清仍因注重漕運而倍加崇奉媽祖，媽祖成為漕運保護神。

（二）元代對媽祖的信奉

至元十八年，朝廷詔海外諸蕃宣慰使、福建道市舶提舉 -- 蒲師文，冊封媽祖為「護國明著天妃」⁴，並於至正九年（1349），詔封媽祖的父母，追榮媽祖先人。

至元十九年（1282）海漕開通後，直沽成為漕運的樞紐，至元年間（1264-

3 王玉，〈古漕今韻〉，《北京水利》，第一期（1999年）。

4 取材自明·宋濂，《元史·世祖紀》，頁124。



1294) 分別建有天妃宮東、西兩廟於大直沽與三岔口。至治元年(1321)朝廷於縉山(今北京市延慶縣)設天妃行宮,可見在元代漕船上已有設置專官以奉祀媽祖。在《元史》本紀中有記載:

1. 英宗至治元年(1321)五月辛卯:「海漕糧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作行殿於縉山流杯池。」
2. 至治三年(1323)二月辛卯:「海漕糧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
3. 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九月癸醜:「車駕至大都,遣使祀海神天妃。」
4. 泰定三年(1326)七月甲辰:「車駕發上都,……遣使祀海神天妃。」
5. 泰定三年(1326)八月辛醜:「作天妃宮於海津鎮。」
6. 泰定四年(1327)秋七月乙丑:「遣使祀海神天妃。」
7. 致和元年(1328)春六月甲申:「遣使祀海神天妃。」
8. 文宗天曆二年(1329)冬十一月戊午:「遣使代祀天妃。」⁵

以上是《元史》本紀中有關元朝廷遣使者祭祀海神天妃媽祖的紀錄,其中泰定三年建天妃宮於海津鎮,海津鎮是在直沽設置的軍事單位,鎮守者為副都指揮史伯顏,由此可知海上漕運是非常重要的,並於此設立天妃宮,可證對於奉祀媽祖的重視,媽祖與漕運關係密切。

元朝廷為大力推展漕運,並祈求漕運平安順暢,以及為答謝媽祖保佑漕運順利,元朝廷曾多次舉行盛大祭典,在至順4年(1333)、至正9年(1349)、至正11年(1351)與至正13年(1353)都派出特使代表元皇帝從北至南祭拜天妃廟,感謝媽祖護漕的功德。並建立一些新的媽祖宮廟,如于平江路(即蘇州)建新廟天妃宮,以利官府大規模祭祀,這些媽祖廟的興建皆與漕運有關,元朝規定,漕運之前須先祭拜媽祖。且將媽祖封號由「靈惠夫人」加封「天妃」神號,元世祖下詔敕封媽祖為「護國明著天妃」,顯揚媽祖「威靈赫濯,應驗昭彰」。在元代對於媽祖共有五次敕封,據學者蔡相輝研究,誥封如下:

1.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以庇護漕運,封護國明著天妃。
2. 至元二十六年(1289)以海運藉佑,加封顯佑。
3. 成宗大德三年(1299)以庇護漕運,加封輔聖庇民。
4. 仁宗延佑元年(1314)以漕運遭風得助,加封廣濟。
5. 文宗天曆二年(1329)以怒濤拯弱,加封護國輔聖庇民顯佑廣濟靈感助順

5 《元史》,轉引自蔡相輝,《《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台北:獨立作家出版,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頁321、322。



福惠徽烈明著天妃。⁶

由上知元代誥封媽祖五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漕運。於《天妃顯聖錄》中記載媽祖靈應事蹟有天曆元年（1328）夏的〈怒濤拯弱〉，並記載天曆二年的致祭：

（天曆）2年（1329），漕運複藉神妃默庇無失，加封「護國、輔聖、庇民、顯佑、廣濟、靈感、助順、福惠、徽烈、明著天妃」，遣官黃份等馳傳具禮，專詣湄洲特祭，並致祭淮、浙、閩海等處各神廟，共祭一十八所。⁷

由上因漕運而遣使由北至南一連致祭媽祖，包含：直沽（天津）、淮安（江蘇）、平江（江蘇）、昆山（江蘇）、露漕、杭州（浙江）、越（浙江紹興）、慶元（浙江寧波）、台州（浙江）、永嘉（浙江）、延平（福建南平）、閩宮（福建福州）、白湖（福建莆田）、湄洲（福建莆田）、泉州（福建）等媽祖宮廟。⁸王敬方《褒封水仙記》中說：「國家漕運，為事最重，故南海諸神，有功於漕運者皆得祀。惟天妃功大號尊，在祀最重。」⁹媽祖是水神與海神，深獲元朝廷支持，媽祖信仰與元代國家利益結合密切，對漕運有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二、元代漕運的河海沿岸媽祖文化

元代漕運大興，廣大信奉媽祖的漕民變成傳播媽祖信仰的民眾；大運河沿岸與海岸的媽祖宮廟是奉祀媽祖的神聖地方，促使媽祖文化隨著漕運而大為發展；媽祖於河海漕運的靈應護佑，成為元代安定社稷民心的信仰力量。人民不僅將媽祖作為海神崇拜，由於大運河漕運的興起，媽祖的神格有了變化，多增為河神，若將江河視為海洋對內陸的延伸，更賦予媽祖為廣泛意義的水神，形成有水之處大都有媽祖文化。以下探析元代河海沿岸各地的媽祖宮廟與文化。

（一）江蘇

江蘇在元代有平江（蘇州）天妃廟、瀏河（太倉縣瀏河鎮）天妃廟、劉家港天妃廟、昆山（太倉）靈慈宮、淮陰清口靈慈宮等。

江蘇平江（蘇州）天妃廟，建於元泰定4年（1327）。《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蘇州府祠廟考》記載：「天妃宮，在北寺東。宋元間創。元泰定4年敕建。明嘉靖22年又敕賜重建。」乾隆《江南通志》也有相同記載，並說明是「海道

6 蔡相輝，《《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頁283。

7 《天妃顯聖錄》，轉引自蔡相輝，《《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頁320、321。

8 地點資料引自蔡相輝，《《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頁322。

9 清·乾隆《海寧州志》，卷14。



都槽萬戶府奉旨敕建」，指出蘇州原來有宋建的媽祖廟，元代「海道都槽萬戶府」設在平江路（即蘇州），請旨敕建新廟天妃宮，以利官府大規模祭祀。

瀏河（太倉縣瀏河鎮）天妃廟始建於元至元2年（1265），全名天妃靈慈宮，俗稱娘娘廟，明代鄭和下西洋曾多次前來朝拜媽祖祈求保佑賜福，故宮廟內立有《通番事蹟碑》，碑文記述鄭和七次下西洋的經過：「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領官兵數萬人，海船百餘艘，自太倉開洋。」；天妃宮現大殿已毀，僅存後樓寢殿二層，重簷硬山式，上面有元代遺留下來的木雕和楠木樑柱等古構件，十分珍貴。另有劉家港天妃廟（路漕廟）（今蘇州太倉市東瀏河鎮劉家港，元代海漕由此港出海，明永樂3年，西元1405年鄭和下西洋出海港。），始建於至元28年；昆山（太倉）天妃廟（靈慈宮），始建於至元壬辰（至元29年）。

淮陰清口的靈慈宮，在淮安府城西南，始建於宋代，萬曆《淮安府志》記載：

靈慈宮：即天妃宮，……在郡城西南隅，舊名紫極宮，宮前環池植柳，名萬柳池，上有升仙橋，宋嘉定間楚州安撫賈涉重建，後毀，元至正又建。本廟宣德間改今名，漕運之香火在焉。¹⁰

由上知在淮安楚州區萬柳池湖心一個小島上的天妃宮（靈慈宮），始建於宋代，舊名為紫極宮，自元代起因受漕運、治河影響，轉為奉祀媽祖，故改稱天妃宮。現淮安月湖即萬柳池，位於淮安區南端，西傍大運河，是淮城三湖：蕭湖、月湖與勺湖勝景之一，月湖中已無天妃宮，但當地居民仍稱此地為天妃宮，應是遺址。

今上海嘉定（原屬江蘇，1958年後劃為上海）的媽祖宮廟，建于宋代，到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重建。上海在元代因漕運而興起；據《元史·世祖本紀》記載：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己未（1291.8.19）元朝廷批准上海建縣¹¹，後來就將這一日定為上海建城紀念日；上海縣在元代建立行祠「南聖妃宮」，是始於宋代松江「聖妃宮」的分靈廟，都是媽祖廟，皆位於今上海。

（二）山東

在德州南回營西有天妃廟，於元代始建的年份不確知，而於元天順庚辰年（1460）重建，之後在明成化辛醜年（1481）及嘉靖年間重建。德州南回營的南關天妃廟亦始建於元代，明代多次重修。

濟寧城北關有天妃閣於元代始建，年份不確知。寧海州北十裡有天妃宮，始

10 清·陳文燭，萬曆《淮安府志·學校志·祀典：卷六》（明萬曆元年刻本，1573年）。

11 張元濟，《二十四史·元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年），頁58。



建於元代至元四年（1267）。登州、德州也有媽祖宮廟，元天順四年（1331）擴建。

（三）天津

依《續天津縣誌》記載天津原有十六座天后宮。據說「先有天后宮，後有天津衛」，「天津衛」指直沽寨（今大直沽），意天津設「衛」之軍事建制（明代）。漕運發達期間，從直沽（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每年有兩萬艘運糧的漕船，加上商船有3萬艘。漕運興起時，即引起商人與船家對媽祖的崇奉，因而於天津周圍的媽祖宮廟愈建愈多，人民所從事的活動包含廟會、漕運、商業交易、鹽務、錢莊等，天津遂成為交通運輸樞紐、商業重鎮與商品集散中心，媽祖文化促進了天津在文化與經濟的發展。

從元建都大都（今北京）之後，大直沽已有天津的雛形，據文載：「元統四海……由海道上直沽達燕都，舟車攸會，聚落始繁，有宮觀，有接運廳，有臨清萬戶府，皆在大直沽。」¹²繁榮的大直沽的宮觀以天妃靈慈宮最尊大，並且「天行海運，其祀尤重」，海上漕運與大運河漕運的安全與暢通皆祈求媽祖女神的庇佑。據《天津縣新志》所述：

（天津最著名的天妃宮有二處）一在大直沽東岸，一在直沽西岸，皆元建，史雲「泰定三年（1326），作天妃宮於海津鎮」，即在直沽者也；其在大直沽者至元年建，泰定間被火重修，時稱東、西廟。每歲海運駛至海濱劉家港，省臣、漕臣齋戒卜吉於天妃靈慈宮，謂東廟也。其後東廟廢而西廟存，加封天后聖母，列入祀典，今名天后宮。¹³

由上，在大直沽建的是天津最早的天妃宮，即東廟。天津海河三岔口的天妃宮，始建於元代泰定三年（1326），時稱西廟。直沽寨（今大直沽）是海運的終點，在這裡轉河船運往大都，根據元史上記載：「至元二十五年（1288），增立直沽海運米倉。」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直沽寨立都漕運萬戶府，使海漕成定制。在直沽寨建的天妃宮稱為「慶國利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祠」，後稱東廟，是漕運官員和船員的信仰寄託，運送大量漕糧和物資到達直沽寨，促進了商業繁榮。《天津縣誌》記載：「延佑三年（1316），置海津鎮，命副都指揮使伯顏鎮遏直沽。」¹⁴海津鎮的設置意義重大，標示此行政區域走向城市化，而直沽寨天妃宮成為天津城市早期發展的起點。

12 王小敏，《草原與海洋的對接——由天津·元明清天妃宮遺址博物館說起》，載《內蒙古日報》第12版（2013年9月2日）。

13 高凌雯，《天津縣新志》卷二十五，天津市地方誌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中》（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053。



至元年間，元世祖忽必烈曾遣張翥（國子監祭酒）到達天津海河三岔口祭祀天妃，張翥祭祀天妃時，曾寫下一首詩《代祀天妃角次直沽作》，描繪拜禱天后的盛大場面：「曉日三岔口，連檣集萬艘，普天均雨露，大海靜波濤。入廟靈風肅，焚香瑞氣高。使臣三奠畢，喜色滿官袍。」¹⁵元代朝廷既加封天妃，又派官員代祀，可見元朝廷對媽祖的敬重。據《元史》祭祀五，〈名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的記載，元朝廷頒佈命令祭祀天妃，故此後元朝歷任皇帝每年皆遣使備禮致祭天妃，或者交付官漕司與當地府官致祭。

（四）北京

上面所提元代第二條皆為水運的漕運路線，江南漕糧經海路到大沽口（直沽，今天津），再經白河、潞河（今北運河）運往通州，最後經通惠河運到大都（今北京），媽祖信仰因此經由京杭大運河中所開鑿的通惠河而傳播到大都，北京雖遠離海洋，亦建有媽祖宮廟，即是大運河的緣故。元代熊夢祥《析津志》¹⁶中《祠廟·儀祭》裡記載：「天妃，姓林氏。興化軍莆田都巡君之季女，生而神異，有殊相，能知人禍福，拯人急患難。」說明元代信仰媽祖。

北京郊區與元代大運河漕運有關的媽祖宮廟還有幾座，如通州建有兩座天妃宮，據清乾隆《直隸通州·建置·壇廟》記述，一座在州城北門內，一座在州北門，開始建置的年代不可考。

《重修京都天妃宮碑記》（明景泰五年，1454）中說：「……京師舊有廟，在都城之巽隅大通橋之西。景泰辛未（景泰二年，1451），由住持道士丘然源援南京例清升為宮。」可知北京原稱天妃廟的官建媽祖廟，景泰二年重修之後，升格為天妃宮。

（五）浙江杭州

杭州是京杭大運河的南方起點，在孩兒巷西的天妃宮始於元代；洪武初年重建；清光緒年間重建時，僅供奉媽祖；現後殿祀媽祖的父母積慶公與積慶公夫人，並于左右奉靈應仙宮與慈惠夫人。早在宋代即有建於杭州艮山順濟妃廟，到清代在杭州有三座天妃宮。¹⁷

14 清·乾隆《天津縣志》卷之三「地輿志」，天津市地方誌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中》（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1。

15 洪肇懋、蔡寅門，《寶坻縣志》卷十八，（清乾隆十年刻本，1745年）。

16 《析津志》輯佚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7 參自《航海女神與杭州的天妃宮遺址》（中華媽祖網 <http://www.chinamazu.cn>）。



三、元代儒佛道背景與媽祖文化呈現三家思想的包容性

元代是一特殊的朝代，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帶領下滅金，忽必烈建元滅宋，統一中國，蒙古族進入中原，形成特殊的社會階級；中國歷史上由蒙古族建立起強大政權，王朝統一並進入中原，促進了各民族的融合。

蒙人敬天，在《多桑蒙古史》中說：「承認有一主宰，與天合，名之曰騰格裡。」¹⁸ 蒙人從君主到人民，皆崇敬天。元代建立，幅員遼闊，與各藩國（含蒙古察合台汗國、蒙古欽察汗國、蒙古伊兒汗國）橫跨歐亞大陸；加上元疆土內的種族也非常眾多，這些因素都讓元代的宗教逐漸呈現多元化，包括：佛教（含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道教、白蓮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含景教和天主教）、猶太教等都取得發展；東西方的商旅、教士往來頻繁，影響力逐漸增加。元朝對各種宗教的態度基本上採取自由放任，對信仰的政策原則上施行兼容並包，因而思想意識更顯多元，也更有利於宗教信仰的傳播。媽祖信仰在元代漕運中的傳播也得以由南往北擴展，並藉由海運向海外傳播。

摩尼教思想吸收猶太教與基督教等教義形成其信仰，傳播到東方之後，又染有一些佛教色彩，從三世紀到十五世紀，自北非傳播到中國福建，遍及歐亞大陸，其文獻使用過漢文、回鶻文等，據推測摩尼教傳播亦是元代多元宗教傳播之時。歷史學家蔡相輝曾將媽祖信仰歸於摩尼教，他在《媽祖信仰研究》一書中提出四種說法：同都是女神信仰、顯靈事蹟類似、信仰傳播路線相似、莆田存留摩尼教遺跡，因而推論媽祖信仰與摩尼教信仰相通，為一特殊見解。

元代皇帝重視儒、佛、道三家思想，採用「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¹⁹ 的政策。儒佛道三家成為中國思想的主軸，在於儒佛道三家分別從不同面向匯合成存在者整體的思考，儒家的核心是社會，佛教（禪）的根本是心靈，道家的主題是自然，正因三者互補，形成儒佛道合一；而這三家所思考的內容包含社會、心靈與自然。儒佛道三家亦有許多相通相合之處，而在文化上融匯成「化剛強為陰柔」的境界。

由許多文獻資料裡的故事，可知各朝代皆紀錄媽祖於儒家、佛教與道教三者中都受到尊崇和重視，而將媽祖信仰的宗教屬性歸於三教的互相認同；故媽祖信

18 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轉引自袁國藩，《元代蒙古文化論集》，頁133。

19 元·劉謐，《三教平心論》，《大正大藏經》52冊（台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電子佛典集成，2010年），頁781。



仰被歸於民間信仰，而與儒、佛、道三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表現儒、佛、道的哲學思想與審美思維。

（一）元代儒佛道三家背景

以下將分別簡要說明元代儒佛道的背景：

1. 元代儒家的背景

《元史》說：「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理學在北方傳播始於宋儒趙復，由於趙復在元軍南征的俘虜中被發現，方才開始宣揚理學。理學的官學地位則在元代確立，蘇天爵〈伊洛淵源錄序〉說：「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周、程、朱子之說為主，定為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從此理學的思想統治貫穿元代社會，這是漢民族文化於元代延續、發展的典型，即使傳統漢法遭受許多衝擊，同時理學思想也注入了新的活躍要素，使得理學地位上升，從元代擴展到後世明清。

元代理學家大多綜匯程朱理學與陸的心學兩派所長，「合會朱陸」成為元代理學的重點。當時的許衡、劉因與吳澄被稱為元代理學三大家。朱學の後繼者為了配合元帝的需求，更注重在程朱理學內的倫理道德思維，從而由學問思辨轉為對道德實踐的重視，這也促使朱、陸學說的合流。元朝在思想上采兼收並用，對各種思想幾乎都加以承認與提倡。

2. 元代佛教的背景

蒙古族原信仰薩滿教，十二、十三世紀，隨著蒙古社會的進展和軍事的征討，接觸到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並逐漸信奉佛教。元帝崇佛，保留蒙古民族草原特質的樸實無華，以講求實利為特色，主要求佛保佑、祈福消災；對於虛玄深奧的佛教義理似乎並無興趣。元代皇帝重新重視儒、佛、道三家思想，《元史》〈釋老傳〉開篇說：「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時君之好惡。」元代佛教的興盛與十代皇帝的崇奉非常密切。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沿著古絲綢之路，旅行到中國敦煌，留下美好回憶而寫下行記；他說：「敦煌偶像教『佛教』徒自有語言。」²⁰至元十七年（1280）元在沙洲路設統管府，從此河西走廊完全受蒙古人統治。元代對敦煌莫高窟的新建和重建即其重視佛教的最佳說明，其佛教以喇嘛教為主，忽必烈曾召請西藏名僧八思巴擔任國師，統管全國佛教，實際上是元代中央政體的顧問；因此，薩迦派密教流行於當時全中國，包括河西走廊一帶；

20 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台北：中華書局，1954年），頁190。



薩迦派密教徒在元代的敦煌石窟中帶入了含有藏傳佛教風格的密教藝術。至正八年（1348）在「莫高窟六字真言碑」上，記載有漢字、梵字、西夏文字、西藏文字、回鶻文字、八思巴文²¹等，可見當時有許多不同民族的佛教徒居住在敦煌地區。

3. 元代道家（教）的背景

元代三教合一的思想盛行，道家思想昌盛。元代受道家思想影響的歷史原因與社會背景較為複雜，其一是因元代特殊的社會階級狀況，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帶領下滅金，忽必烈建元滅宋，統一中國，當時的漢文人和儒士的社會地位低下，但漢文化中以老莊思想為主的道家學說卻受到統治階級的庇護，這其中原因乃全真教²²的掌門人丘處機多次利用自己與成吉思汗的良好關係為道家文化增長勢力，而全真教是個具有強烈民族意識、以老莊道家學說為宗旨的宗教，這使得文人士大夫找著可保存身家性命又能慰藉心靈的理想之處。

（二）元媽祖文化呈現儒佛道思想的包容性

從媽祖故事的研究顯示媽祖信仰的本質包含儒家、佛教與道教（家）三種思想。在媽祖與儒家的相關故事中，媽祖的忠孝和仁愛事蹟，包含孝悌救親、濟世救難、護助河海運與漕運等神跡，皆以儒家觀點闡揚。在媽祖與佛教的相關故事中，媽祖的降生傳說與觀世音菩薩有密切關聯，如今媽祖廟裡媽祖與觀音共祀一廟是普遍情形，顯現與佛教的關係。在媽祖與道教（家）的相關故事中，有媽祖其學道道成的故事，媽祖經由道教成為救世靈女，在道教經典中將媽祖列入道教的神明，並得天尊指派天妃下凡，可知媽祖信仰被歸入道教系統中。故媽祖故事與儒、佛、道的聯繫非常明晰。

媽祖助漕神跡，於元大德三年（1299），因護漕有功而受封。並有天曆元年（1328）的神跡，據《天妃顯聖錄》〈怒濤拯弱〉記載：

-
- 21 忽必烈命八思巴創造蒙古新字，在1269年頒行，但這種蒙古字字形複雜，難以學習書寫，只能在蒙古貴族間使用，並沒有普遍流行於民間；到了元代後期，畏兀兒體蒙文又漸通行各地。
- 22 全真教是中國道教的重要派別，金代時由王重陽于山東寧海所創立。王重陽仙遊羽化後，弟子七真等人接任掌門。全真教地處金國之內，故在劉處玄、丘處機和王處一掌門時，都承認金國的政權。蒙古族成吉思汗西征時，邀請丘處機前往西域與他會面，詢問治國和養生之法，丘處機以敬天愛民、減少殺戮、清心寡欲等為回復。成吉思汗稱丘處機為「神仙」。因丘處機見成吉思汗，致使全真教在元代得以壯大。元代忽必烈偏信佛教，全真教受到嚴重打擊，到元成宗時才重新正常發展。全真教的教義，繼承了鍾離權、呂洞賓的內丹思想；並提倡三教合一，三教平等，認為儒家、釋教、道教的核心都是「道」；其宗教實踐的原則是「苦己利人」、「利人利己」。



天曆元年(1328)夏，備海道萬戶府分司運糧，至大海，遭颶風驟起，巨浪連天，七日夜不息，人因力疲，運艘幾於翻覆。舟人哀號，仰禱神妃求佑。會日暮，有形從空而下，掩映舟中，輝耀如晝，宛見神靈陟降。少頃，怒濤頓平。船上覺異香縝鬱。自此水道無虞，徑抵直沽都省。奏聞，奉旨差翰林國史院學士普顏實理欽禦香，馳驛致祭。²³

此年漕運糧食欲經海運航至直沽，途中突遭颶風襲擊，連七天日夜巨大風浪，漕船幾乎翻覆，漕運人員祈禱媽祖救助，恍若見到神妃降臨船中，光輝如白晝，一會時間，海濤立刻平息，船上飄逸濃郁奇香，過後水道航行平順，直抵直沽都省。漕運官員秉奏朝廷此事蹟，翰林國史院學士普顏實理奉皇上旨意，奔馳前往獻香致祭媽祖，表彰庇護漕運有功，可見媽祖表現儒家精神護國庇民，以及佛教慈悲為懷、救濟世人的心，亦顯現媽祖經由道教成為通賢靈女，能顯神駕雲渡海、驅邪救世。

元至順元年(1330)媽祖幫助漕運，依《天妃顯聖錄》〈神助漕運〉中記述：

至順元年庚午(1330)春，糧船七百八十只，自太平江路太倉劉家港開洋，遇大風突起，波憾星辰，桅檣飄蕩，數千人戰慄哀號。官吏懇禱于神妃，言未已，倏陰雲掩靄，恍見空中有朱衣擁翠蓋，佇立舟前，旋有火照竿頭，晶光如虹。舟人且驚且喜。無何，風平浪息，七百餘艘漂流四散，正集合整理篷槳解纜而進，又聞空中有語雲：「可向東南孤島暫泊。」眾即撐舟依孤島旁。方拋碇，江上狂飆迅發，暴雨倒峽。舟人相慰曰：「非神靈指示，我等皆在鼉宮蛟窟矣！」次日晴霽，遂達直沽交卸。中書奏神護相之功，奉旨賜額曰「靈慈」。²⁴

元朝廷漕船 780 艘裝滿漕糧，自江蘇太平江路太倉劉家港將運往河北，漕船中途遇大風，情況危急，漕運官兵數千人驚怕哀號，官員祈求媽祖相救，立刻恍見神妃佇立船前，不久風浪平靜，七八百多艘飄散的漕船正在集合整隊前進，空中突有言語疾呼：「可向東南方孤島暫時停泊。」當所有糧船停靠孤島，江上暴風雨迅速大作，全體漕船倖免於難，隔日天晴，安全將漕糧運到直沽，平安返航。媽祖神靈護佑漕運，再次見到媽祖以佛、道本質而顯現神靈，救人利人，扶危濟險；也是儒家「忠義」、「仁愛」、「和平」的呈現，促使媽祖信仰由南往北發展；

23 《天妃顯聖錄》，轉引自蔡相輝，《《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頁 320。

24 《天妃顯聖錄》，轉引自蔡相輝，《《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頁 321。



官員奏請朝廷褒封媽祖，奉旨頒賜廟額為「靈慈」。

元代對於漕運的重視，造就媽祖的祭祀成為元代國家祭祀中特殊的地位，並納入朝廷祭典，媽祖文化的祭禮因漕運而隆重。在大運河漕運沿線重要的地點皆設有媽祖宮廟，於每年漕運初，朝廷都有遣使致祭，在漕糧順利運達後亦遣使代祭。在漕府重地平江路（蘇州）的三個重要媽祖宮廟，享有與古代吉禮「祈嶽瀆」同等的祭祀，為歷代之首。所謂「祈嶽瀆」即帝王親自祭祀或派遣官員代祭五嶽四瀆等名山大川之神，以表對大自然的崇敬，五嶽指中嶽嵩山、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漢代南嶽灑山，今安徽天柱山）、北嶽恒山，四瀆指長江、淮河、黃河、濟水。《元史》祭祀五，〈名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說：

凡名山大川、忠臣義士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之，惟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直沽、平江、周涇、泉、福、興化等皆有廟。皇慶以來，歲遣使香遍祭，金幡一合、銀一錠，付平江漕司及本府官，用柔毛、酒醴，便服行事。祝文云：維年月日皇帝特遣某官等致祭於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²⁵

由上可知元朝廷對媽祖的加封與賜祭不少，每年派遣使者前往祭祀，於平江的媽祖宮廟所行的祀典非常慎重。

「元之五禮，皆以國俗行之，惟祭禮稍稽諸古」「國俗」指蒙古舊俗，「古」指漢地傳統祭禮，媽祖的祭祀主要以漢傳統祭禮「祈嶽瀆」行之，再融入些蒙古禮制，祭祀音樂也是在古制雅樂的基礎上，融入蒙古音樂因素。整個祭祀的規程致以「大享儀」（即《禮記》「大饗」儀），含齋戒、省牲、晨裸等程序，完全依禮進行，配以樂舞，儀典莊嚴隆重，符合儒家崇禮重祭，尤以佛、道神靈「天妃」護海運有功而致祭，顯示對媽祖祭祀極為重視。

媽祖信仰透過祭祀的儀式，祈求平安，及實現生存需求與人生理想，這一切皆在媽祖文化中表現出來，而民眾對於宗教信仰大都有功利的需求，這許多的祈求均有功利的成分，故民眾祈求現世生活的平安，商人祈求經營事業順利，集體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五穀豐收、工商丕利等，都是合情合理的。

25 《元史》祭祀五，轉引自蔡相輝，《《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頁 284。



四、元代貿易背景及媽祖文化展現經貿精神

蒙古族以遊牧漁獵維生，文明程度較漢族低，並無漢民族深厚的綱常倫理想，此種不受任何常規或模式限制的特點，較易接受新事物，因而元代具有開放、包容的審美特性，在開創元代後，貿易的方式亦積極拓展海上貿易，建立起與世界各國互相往來的海洋經貿關係。

（一）元代貿易背景

元代的軍事征服曾到達歐洲和北非，震驚全世界，在陸地上，元代在中國各地皆設置行中書省（吐蕃地區除外），中國的行政區域規劃乃由元代奠定基礎，而周遭鄰國都曾被元征討，有些還設置過行政區。元世祖忽必烈所建立的疆土是中國史上最遼闊的，據《元史》地理志與《元代疆域圖敘》記載：東北至鄂霍次克海，西南到今西藏、雲南，西北到今新疆，南至南海包含南沙群島，北至西伯利亞，總面積達 1400 余萬平方公里。

在海路上，元代的港口主要是泉州、慶元（今寧波）、廣州、溫州和杭州等地，主以和平貿易的方式建立起與世界各國互通的網絡，遠至波斯灣與阿拉伯半島。據廣東陳大震編輯的《南海志》記載：「元代與中國發生海道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有 140 多個」，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則「列舉有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

26

大運河的漕運與海路的漕運是元代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基礎，並透過海路的港口建立了與全世界貿易互通的網絡；這基礎的重要文化力量就是媽祖文化。元代促使海上絲綢之路有良好的推展，發展了和平貿易、友好互動與文化交流，在這條世界海洋貿易的海上絲路上，使得中國人、馬來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臘人、羅馬人和埃及人等都能有所交流。

隨著元蒙征服者地位的壯大以及國際貿易的頻繁，作為貢品或交換物的奇珍異寶源源而來，今人劉禎說：

從海道「舶貨」的種類繁多，根據其性質，大體可分為寶物、布匹、香貨、藥物、皮貨和雜物六類。「寶物」主要有：象牙、犀角、鶴頂、珍珠、珊瑚、碧甸子、翠毛、龜筒、玳瑁等。陳大震編輯的《南海志》說：「故海人獸山之奇，龍珠犀貝之異，莫不充儲於內府，畜玩於上林，其來者視昔有加焉。」

26 《南海志》與《島夷志略》的資料引自劉禎，《勾欄人生》（《華夏審美風尚史》第七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頁38。



而珍貨之盛，亦倍於前志之所書者。」尚新逐奇成為一種時尚。²⁷

以上追逐新穎奇異亦說明元代的開放性形成審美的特性。當時商業工藝發達，貴族官吏生活奢華，國內外交通四通八達，造成中國經濟的高度繁榮，開放性在元代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在元代國內各民族與國外不同種族的人，他們懷著各種目的來到中國，例如商務、探險、傳教、旅行、戰俘等，形成一股風潮，並逐漸融至儒家倫理的漢民族生活中；他們駁雜的意識思想、宗教信仰、價值觀、生活習俗和方式，以及相異的審美觀念和追求，都帶給元代社會衝擊和影響，造成元代文化思想不拘於傳統或規範，呈現開放與兼容並蓄的特點。

由於商業經濟發達與東西交通方便，使得元帝國成為當時東亞地區一個強盛、富裕的大國，至元十一年（1274），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沿著古絲綢之路，旅行到中國，留下美好回憶而寫下《馬可波羅行紀》²⁸，可看出元代的盛況。

（二）元代媽祖文化展現經貿精神

由於漕運，大運河與海運相連，因而大運河與海上絲路相通，並且大運河是海絲暢通的基礎，因大運河為海上絲路提供了必要的充足的貨源；媽祖文化也藉此傳播到亞太地區和世界各地，這其中媽祖文化展現高度的經貿精神。大運河的漕運使得沿岸的港口城市與老城鎮的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如杭州、嘉興、吳縣、無錫、常州、鎮江、揚州、淮安、臨清、濟甯、張秋、滄州與通州等，更誕生了天津與德州等新城鎮，沿著漕運將漕糧由南方運到北方各地，同時也將媽祖信仰傳播到海岸與大運河沿線；又借著海上絲路，而將媽祖信仰傳播到海外各地。

以天津的西廟「天妃靈慈宮」（泰定三年，1326年建立）來說，其位於今海河三岔口，三岔口即南、北運河與海河的交匯點，是南糧北運的卸糧處，也是直沽運漕糧到元大都（北京）的起點。元代在海河三岔口的海洋漕運、運河漕運以及其他商品物資的運輸都沒有停過，而且停在三岔口和天妃宮前碼頭的船隻繼續增加，使得直沽碼頭向海河下游延伸，並與東廟所在的大直沽碼頭串聯起來，建有廣通倉等幾十座糧倉，成為繁榮的地區；船隻在此三岔口聚集，促成商品的交易，西廟也成為經貿發展的中心。

元代海漕的始點港為劉家港，終點港為直沽的大直沽，《新元史·朱清張瑄傳》記載：海漕創始人朱清、張瑄徙居太倉，「營建第宅，開海道於直沽，糧船

27 同前劉禎，《勾欄人生》（《華夏審美風尚史》第七卷），頁38。

28 參見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



商泊雲集於市」元代王懋德的詩《直沽海口》：「極目滄溟浸碧天，蓬萊樓閣遠相連。東吳轉海輸粳稻，一夕潮來集萬船。」以上皆呈現透過海運使得漕船雲集於直沽的盛況。海運從始點港運來漕糧，也運來浙閩蘇江淮一帶的珍貨，手工業和商貿業均發展起來，終點港商人聚集，直沽成為南北貨物集散地和貿易中心；媽祖文化也隨著海船，從劉家港到直沽，帶著濃厚的海商精神。

至元二十四年（1287），朱清「大通番舶，琉球、日本、高麗諸國商泊咸集太倉，稱天下第一都會。」因而促使元代與琉球、日本、高麗各國開展海外貿易，劉家港也被稱為「六國碼頭」，由國內海漕的港口晉身為與國外交通貿易的港口。太倉劉家港同時是河運港口與海運港口，媽祖文化因漕運、海運而大興，天妃廟（靈慈宮）始建於至元二十九年（1292），媽祖文化的經貿精神十分濃郁。

媽祖文化展現經貿精神，從最初媽祖庇護商船航行平安順利，而讓商務昌盛豐收，商人感念媽祖的恩德，因而信奉媽祖。為了榮耀媽祖及推展媽祖信仰，商人奉獻許多。商人認為支持媽祖廟的建立和媽祖文化活動的推展，是屬於有福報的善舉，並符合儒家的道德行為。而且建廟、辦慶典等可以帶來人潮，提升市況，促進消費，讓經濟活絡，營造經濟的需求和供給，讓社會的經濟更加繁榮發展。故在港口或交通樞紐所在地，常可見到媽祖宮廟。

關於媽祖文化展現經貿精神，大運河漕運使得沿岸城市港口的經濟快速發展，大運河亦為海上絲路提供充足的貨源，媽祖文化藉此傳播到海內外各地；商人祈求與感念媽祖的庇佑，為榮耀媽祖而興建媽祖宮廟與更加推展媽祖信仰，媽祖文化因而展現高度的經貿精神。

結論

基於以上的探析，本文對於元代河海漕運之媽祖文化研究，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漕運對媽祖文化之影響巨大，而南糧北運的漕運任務在定都於北京的元時期特別重要，漕運攸關朝廷官軍需求、國計民生和政權穩定，然而漕運路途艱辛遙遠，漕運的安全順利有賴媽祖庇佑護航，故崇信媽祖非常熱烈，媽祖成為大運河與海洋漕運的保護神。元代為祈求與答謝媽祖護漕，朝廷曾遣使多次與從北至南一路祭祀媽祖宮廟，並建立新媽祖宮廟，及五次敕封媽祖。

第二，元代河海沿岸的媽祖遺跡，包含江蘇、山東、天津、北京與浙江杭州的媽祖宮廟與文化，江蘇有平江天妃廟、瀏河天妃廟、劉家港天妃廟、昆山靈慈



宮、淮陰清口靈慈宮等。山東在德州南回營、濟寧城北關、寧海州北和登州等處有天妃廟。天津大直沽（東廟）與海河三岔口的天妃宮（西廟）最為有名；北京通州有兩座天妃宮等；杭州是京杭大運河的南方起點，在孩兒巷西有天妃宮等。大運河沿岸與海運沿岸的媽祖宮廟是奉祀媽祖的聖地，亦促使媽祖文化隨著漕運而拓展。

第三，元代是蒙古族進入中原統治的朝代，對於各種宗教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思想意識多元化，其儒佛道背景十分特殊，元皇帝採用「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政策，對儒佛道三家思想極為重視。元代媽祖文化亦呈現哲學思想的包容性，與儒家、佛教、道家（含道教）等思想的融合一直不斷的進行，產生兼容並蓄的崇高意境。元朝廷為答謝媽祖庇佑漕運，多次舉辦盛大的媽祖祭典，漕運前後均遣使致祭，享有與古代吉禮「祈嶽瀆」同等的祭祀，於媽祖宮廟的祭典莊嚴隆重，顯示對媽祖信仰的尊重。

第四，由元代的貿易背景可知元積極拓展海上貿易，促使海上絲綢之路的推展，建立起與世界各國的海洋經貿關係，而重要的文化力量就是媽祖文化。元代媽祖文化亦展現充分的經貿精神，透過漕運使得大運河與海運相連，並與海上絲路相通，海漕的始點港為劉家港，終點港為直沽的大直沽，港口成為貿易中心以及與國外交通貿易的要港，商人祈求、蒙受與感念媽祖的庇佑，媽祖文化因漕運與海上絲路而大興，帶著濃厚的經貿精神。

元代漕運經由水路運送稅糧物資，致使大運河與海運的交通與經濟大為發展，影響媽祖文化的傳播更為開展；相輔相成的，媽祖信仰為元代河海漕運與海上絲綢之路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持力量，商眾與民眾祈求媽祖庇佑平安順利，媽祖文化亦影響人們的德行與涵養，而讓人們擁有善良的心，並開創生命的價值，發揚媽祖慈愛助人的情懷與經世濟民的理想。



參考文獻

- 元，劉謐，《三教平心論》，《大正大藏經》52 冊，台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0 年。
- 明·宋濂，《元史·世祖紀》、《元史·食貨志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 明末清初·照乘，《天妃顯聖錄》，台灣文獻叢刊第 77 種，台北：台灣銀行發行，1961 年。
- 清·乾隆《海寧州志》，卷 14。
- 清·乾隆《天津縣志》卷之三「地輿志」，天津市地方誌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中》，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 年。
- 清·陳文燭，萬曆《淮安府志》，明萬曆元年刻本，1573 年。
- 《宋史》，卷 93，河渠三。
- 王玉，〈古漕今韻〉，《北京水利》，第一期，1999 年。
- 王小敏，《草原與海洋的對接——由天津·元明清天妃宮遺址博物館說起》，載《內蒙古日報》第 12 版，2013 年。
- 洪肇懋、蔡寅鬥，《寶坻縣志》卷十八，清乾隆十年刻本，1745 年。
- 高凌雯，《天津縣新志》卷二十五，天津市地方誌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中》，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 年。
- 張元濟，《二十四史·元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 年。
- 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台北：中華書局，1954 年。
- 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
- 劉禎，《勾欄人生》（《華夏審美風尚史》第七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蔡相輝，《《天妃顯聖錄》與媽祖信仰》，台北：獨立作家出版，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 《析津志》輯佚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 《航海女神與杭州的天妃宮遺址》，中華媽祖網 <http://www.chinamazhu.cn>。

